

中日政治关系 60 年 回眸与思考

高 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摘 要】新中国建立以来中日政治关系经历了从坚持斗争、以民促官，到恢复正常国家关系，乃至克服障碍实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曲折历史。2008 年，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发展战略互重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将成为今后中日两大民族维系健康稳定的国家关系准则。回眸与思考新中国建立以来 60 年中日政治关系，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全面、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关键词】 中日政治关系 60 年 回眸与思考

60 年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可谓短暂的一瞬，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却是一部从坚持斗争、以民促官，到恢复正常国家关系，乃至克服障碍实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曲折历史。今天，为了实现中日两大民族长远与根本利益，两国政治关系更需要从大局出发，依照战略互惠关系框架努力实现全面、稳定、健康的发展。

一、恢复邦交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战后，日本处于美国占领之下采取全面追随美国以图复兴的策略。《旧金山和约》签字后不久，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与台湾当局缔结“日台和平条约”，建立“外交”关系，从而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的障碍。中国的严正立场则是：这是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最露骨的挑衅，也是同日本人民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和平关系的愿望绝对不相容的。

（一）“尼克松冲击”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早在 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就给中日间的所

谓“台湾问题”成为日本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第一，日本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第二，日本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日本是否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围绕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调整了亚洲战略，决定把中国这个主要“敌人”化为“朋友”。1971 年 7 月，美国背着日本同中国秘密接触，打开了改善关系的大门。而日本则尝到了被美国的“越顶外交”背叛的苦涩滋味。在日本各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大背景下，田中政府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先与中国复交。然而，中日复交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在对华协调方面，由于中日间尚不存在官方关系，自民党又长期执行了反华政策，致使两国政府间沟通尚有困难。1972 年 9 月 25 日至 30 日田中角荣首相率团访华，同周总理进行了 4 次会谈。9 月 29 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努力

复交后的中日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上个世纪 70、80 年代出现了历史上最好局面。尽管日台间“官方”关系已不复存在，但根据中日协议精神，日台之间的民间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继续得到发展。但是，中日之间能否构筑和平友好关系，还取决于如何对待和平条约、体制差异及反霸权条款等因素。

一方面，中日作为曾经交战的两国，有必要以和平条约形式彻底结束战争状态。1972 年 7 月 26 日，周总理在与竹入谈话时提出希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在条约里加进“友好”二字，意味着把中日关系从结束战争状态的水平进一步升华为友好关系。此后，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中日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而构筑和平友好关系，是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事关世代友好的长远大计。

另一方面，中日间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是战后中日关系的又一敏感问题。钓鱼岛问题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进程中上升为一大障碍。1974 年 10 月 3 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提出：“谈判时，钓鱼岛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1978 年 8 月 10 日，邓小平副总理在与园田外相的会谈中提议搁置 20 年 30 年，日方没有表示异议。最后的障碍由此被扫清，双方于 8 月 12 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作为中日政治关系发展的直接后果，1979 年末日本决定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及中国决定接受该贷款，标志着中日经济关系进入了以“官方主导，以官带民”的新阶段。中日政治关系中的第一、第二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随之成为规定中日关系诸项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1982 年 5 月底 6 月初，赵紫阳总理在访日期间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三项原则，得到铃木首相的赞同。1983 年 11 月 23 日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时，中曾根首相提议再增加“相互信赖”原则，得到了胡总书记的赞同。这四项原则虽未形成两国间正式文件，但却高度概括了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领域的努力目标，成为两国共同准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克服冲突摩擦迈向战略互惠关系

《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订立使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一）政治、经济关系快速发展时期

此后，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中日政府成员会议（1980 年起）、中日外交事务当局定期协商（1980 年起）、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1984 年起）、中日民间人士会议（1982 年起）等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协商机制不断完善。以贸易、投资、援助为主要内容的中日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如中日贸易 1972 年为 11 亿美元，1988 年超过了 190 亿美元），教育与文化交流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二）两国政治上矛盾摩擦积聚时期

然而，80 年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和双方国内条件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出现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高潮，日本却受到“55 年体制”崩溃和泡沫经济破灭的冲击。尽管 90 年代中国的外交方针并没有发生变化，其基本内容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但随着走向政治大国目标，“55 年体制”崩溃后的日本政界“总体保守化”趋势中，主张摆脱“历史包袱”、把对华“友好关系”调整为“普通关系”的势力抬头。从 1993 年起，日本政界为侵华历史翻案的动向呈现上升趋势，中日关系却开始呈现“政冷经热”局面。

1995 年和 1996 年中日围绕诸敏感问题出现了全面摩擦。1995 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村山首相等人主张在国会通过反省侵略的决议，但遭到翻案势力的顽强抵抗。同年 8 月，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了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书，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案。1996 年 7 月桥本龙太郎作为现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 1985 年中曾根以后现任首相不再去参拜的承诺。自民党公然把“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写入 1996 年的大选纲领之中，并要求文部省删除中学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罪行的记述。1998 年 5 月份，日本各地影院上映公然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自尊—命运

的瞬间》，令所有中国人再次感到极度愤慨。

冷战结束以来，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环境、双方国内条件以及两国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上述各问题领域都出现了新情况。世纪之交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将取决于双方能否就保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促进相互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及时排除其中的消极因素。

（三）“台湾问题”使两国关系复杂化

日本政局变化不仅影响了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矛盾斗争，也对台湾问题产生了影响。9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了“台湾变质论”和“民意决定论”。前者主张当今的台湾当局已实现更新换代，不同于当年被驱逐出大陆的国民党政权。后者则主张台湾居民可以“民主地”决定是否赞同统一，蓄意把社会制度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混为一谈，试图以此破坏中国实现统一。此外，还有所谓“台湾冲突国际化论”，宣称无论台湾问题是否中国的内政，只要台海发生冲突，就会扩散为国际问题。通过玩弄“周边”这一含糊其词的概念，以“能够给日本的安全带来重大影响的事态”否定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历史承诺。

面对日本在处理对华政治关系上的变化，中国政府与领导人采取了坚持原则立场，针对日本方面的错误做法开展必要的外交斗争，努力在斗争中求得两国关系友好发展。1997年11月，李鹏总理访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五原则“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对话，增进了解；互惠互利，深化经济合作；面向未来，实现世代友好”的主张，中日两国政府签署渔业协定。1998年4月，胡锦涛副主席访日，强调“发展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1998年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新的《中日联合宣言》明确中日两国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四）小泉执政期政治关系严重倒退

进入新世纪后，中日关系继续在经济贸易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仍旧充满了政治矛盾与斗争。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击败了党内强有力的政

治对手桥本龙太郎，组建起号称“无禁区改革”、“砸碎自民党”的小泉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小泉顽固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严重倒退。90年代两国关系上显露出的“政冷经热”在21世纪前五年成了中日之间限制国家关系发展的现实。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纠正错误。同年4月20日，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以治病为名赴日。中方提出严正交涉，采取冻结中日高层往来、军舰访日、安全对话等措施。小泉的错误做法不仅激怒了中国人民，也引起日本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中日在关系直线跌落到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1998年到2008年是中日间由“第三个政治文件”过渡到“第四个政治文件”的十年，也两国政治关系由低谷转向回声发展的十年。尽管冷战早就结束了，但遗留下来的冷战思维仍使得某些日本政治家视中国的发展为威胁，不幸的战争历史业已成为过去，却偏偏有人就是要用歪曲历史事实的手法破坏两国关系的改善。

如果我们从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久远的时间尺度来观察，中日关系走到今天既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也包含着双方坚持不懈努力。无论古代中华文明对日本列岛的孕育滋养，还是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祸患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全民觉醒，中日都不曾处于同一发展的水平线上。至于战后分属东西方不同营垒与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分疏，以及长期处在美国羽翼下的日本在处理对华事务上唯其马首是瞻，中国与日本一直是一对看似很近实则很远的邻国。冷战结束后的大国关系调整时期，中国与日本第一次面临着综合国力旗鼓相当的局面。这种前所未有的对等和接近，曾使双方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对方关系的课题，是否是“一山难容二虎”？“两强相向是否必然导致两强相撞？”等一系列令人焦灼的提问摆在两国政府与所有关心两国关系的人们面前。

（五）“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首脑外交之旅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双方有识之士多年努力，中日关系终于朝着正常的国家关系轨道变化。当

中国领导人展示出泱泱大国的气度与四海一家的襟怀，日本领导人也改变了小泉等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两国在经贸科技领域的互补性以及节能环保领域的共同利益，不仅夯实了政治关系的基础，也带来社会文化交流的飞跃发展。2006 年到 2008 年间中日领导人致力于恢复首脑外交带动国家关系全面发展，“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首脑外交可谓今天中日关系的生动写照。

2006 年 9 月，在小泉的“禅让”和精心帮助下，以安倍为核心的战后出生的战略派政治势力接掌了政权。在战略派政治家眼中，要谋利益、谋长远，而道德并不是一个必须计算在内的考量。于是，凡属观念性的问题——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历史观念、文化价值，统统不如实际的利益来得重要。同样，日本的强硬战略派政治集团所一贯追求的正是建立强大日本国家，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具体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是完全可以依据现实环境来调节和变动的。身为日本首相的安倍，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忍让，也可以放低身段，与中、韩等国商讨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他的主要智囊集团意识到日本有必要变换对华策略。

在 2006 年 10 月安倍主动踏出改善关系的第一步——访问北京打开日本亚洲外交僵局的“破冰之旅”。双方发表的中日联合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双方同意，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双方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显示出一直种面向未来的超越姿态。但同时，安倍主导下的日本对华外交还包含着组建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同盟”，企图用“意识形态围墙”围堵中国的意图。这种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在安倍执政后期变得越来越明显。

2007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在访问期间，温家宝与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进行了会谈并就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安倍首相于年内再次访问中国等问题达成共识。他们二人还共同主持了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启动仪式。福田康夫内阁建立后迅速关闭了安倍搞的“美丽国家”的办公室，停止了前任效仿美国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暂缓推进修改宪法的政治日程表。这一系列行动展示出新内阁在立国思想理念上的新意——不是通过军事努力实现大国主义目标，而是将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环境、气候、能源等问题列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的切入点，在积极的协商、对话中增加日本的发言权。

2007 年 12 月 27 日至 30 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问中国，期间他会见了胡锦涛、吴邦国和温家宝。并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前往山东曲阜孔庙参观。福田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做邻国不喜欢的事情，专家将福田此次来访称为铺垫之旅、迎春之旅。显然，福田本人及其被舆论称为“新福田主义”的政治、外交路线比他的两位前任更容易被邻国接纳。

2008 年 5 月，胡锦涛主席带着中国人民发展中日关系的友好感情和坚定信念踏上“暖春之旅”，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继两国 1998 年发表作为“第三个政治文件”，即 1998 年《中日联合宣言》之后缔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文件。可以说，“第四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战略互惠成为中日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今后中日两大民族要维系健康稳定的国家关系，就必须按照“第四个在文件”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立足长远战略目标，从造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动力。

三、发展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中日关系以其深沉久远与密切关联著称于人类通交往来的历史。就总体而言，千百年来两国关系未曾中断，经历风云变幻，历久而弥新。一方面，古代文明中惟有中华文明经受住各种考验在朝代更替中保存延续，得益于海洋屏障保护的日本文明也得以保全并沿袭至今。另一方面，两国之间文化相互浸润共同构筑起东亚通交往来历史

史，由汉唐贯穿至当代的人员往来更是绵延不绝。

那么，中日下一个 30 年该怎么走？恐怕在 21 世纪上半期，中日关系仍将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两国关系之一。两国之间曾有过不幸的历史仍旧纠缠着我们；两国正在面临着领土争端、能源博弈、地缘政治、美国因素等现实中的战略困境；食品安全等“突发事件”和敏感“民族感情问题”也不容忽视。但是，从积极在角度思考，两国在经贸、金融、环保、能源、人才、研发、军事、政治等方面积极而耐心地扩大合作领域，踏实而多面地展开交流，就可以大规模推动东亚的繁荣，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

（一）应当努力为新时期中日关系定义、定性及定位

本文中使用的“新时期”特指当前所处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指复杂多变的时局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延伸持续的特定阶段。具体到中日关系，“新时期”可以理解为两国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战略互惠关系”后，即将在新型关系框架下以相对稳定的状态走行的历史阶段。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作为思考的“质料”，沿着“定义——定性——定位”的递进方式辨析，主要是基于剖析中日关系时逻辑上的解构顺序。因为，“定义”是对一种事物本质特性或其内含、外延的确切说明；“定性”是对一种事物所包含的性质、成分做出准确裁量；而“定位”则是将该事物置于适当的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换言之，作者的意图在于把现实中的中日之间的关联作为解剖对象，通过“探求其本质——分析其特性——评价其地位”勾画出两国关系明晰而立体的图景。

可以说，今天对中日关系所包含的性质、成分做出准确裁量，巩固中日间的政治互信仍旧是艰难而且迫切的课题。这就很容易使人想起竹内实的名言：“友好容易理解难”，而达成真正的互信共识则更难。显然，没有真诚的信任就不足以真正实现双方长远和根本的国家利益，而不以正视历史事实为前提，试图光凭借经济意义上的合作就可以把历史这一页匆匆忙忙地翻过去，只能是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二）战略互惠关系需要一种动态平衡

中国与日本“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互惠合作关系”是历史性的，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中日国家关系发展基本准则的出现是两国关系成熟发展的标志。“战略互惠关系”合作的动机将永远是利益——相互获得利益，实现双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所以，在今后发展好中日关系在诸多因素中，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与稳定极为重要，尤其要防止政府间政治互信的丧失，防止民间友好感情渐行渐远。

具体言之，在当前条件下除加强官方与民间的接触交往外，两国应争取实现一种能够容纳双方发展诉求的“动态平衡”。首先，实现动态平衡，符合构筑和谐的国际秩序与和谐周边环境的需要。在社会运动中，当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关系就已经产生，所以平衡是大势。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有历史必然性，但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为其他国家和民族保留生存、发展的空间，就谈不上构筑和谐世界，也无法从根本上打消别国，尤其是危机意识较浓烈的邻国的“中国威胁”感受。

其次，实现动态平衡，符合提升两国经济关系的需要。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除开日本大国主义路线和美国全球战略等主要因素外，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旧的平衡，客观上给日本造成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近 20 年来，中日在国民经济与国家综合实力的对比关系，是中国的飞速发展与日本的相对停滞，这种反差进一步加大了不平衡性，客观上给两国关系上的矛盾火上加了油。然而，国际社会政治运动，历来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与重新取得新的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发展演进。就中日经济互补性强，两国关系远未饱和，需要在共同发展中取得一种新的平衡关系。

第三，动态平衡有别于静态平衡，要在“动”中求“衡”。动态平衡反映事物内部总量的变化规律。事物的动态平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是变化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笔者主张在双方发展的动态变化中寻求新的平衡，就是要明确告诉日本，日本应该理解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在其他各方面力量也将增长，进而论证了中国发展的合理性，为中国自身

的发展保留出可以不断扩展的空间。

(三) 交错在全球战略格局与地缘政经结构中的两国关系

当然, 作为毗邻在东亚的两个大国, 中日之间也必然面对着国家战略利益的对峙与分歧, 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纠葛在一起, 更是难于一蹴而就解决。在这里, 抛弃冷战思维与旧的零和博弈观念, 树立真诚的政治互信, 立足大局和放眼长远就显得十分必要。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近邻, 两国的经贸合作各有优势, 应该优势互补, 而且合作的潜力是很大的。中日两国 GDP 相加约占东亚 GDP 的 80%; 人口相加约占东亚人口的 70%; 进出口贸易额约占东亚贸易额的 60%。毫无疑问, 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 持续改善并发展双边关系, 必将对东亚以及世界局势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有利于两国通过双边渠道促进东亚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进程, 对于构建东亚地区的和谐秩序十分有利, 对于世界经济的走向也将产生推动性的影响。福田内阁时期的外交智囊五百旗头真曾经说: “中国正在摆脱百年低迷期, 不用很久就能夺回东亚国际关系的中枢地位, 日中关系的和平发展对日本极具战略意义。” 日本人重实惠, 一是中国已经崛起; 二是日本经济越来越仰赖中国市场; 三是美国经济实力已相对下沉, 大环境迫使日本不得不回到亚洲来, 但零和理论也不符合现实。中日携手合作不仅可稳定亚洲的局势, 包括朝鲜半岛局势的转趋平稳, 也可加速东亚的经济成长, 包括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实现。

在新的形势下中日两国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 面临着新的合作机遇。双方应本着战略互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 创新合作方式, 解决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障碍, 扩大共同的利益, 积极推动两国在贸易、投资、能源、环保、信息、通讯、物流、金融和高科技等更加宽广的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务实合作, 两国企业还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 携手开发在第三国(国际市场)上的合作, 共同谱写中日睦邻友好、互利互惠和谐供应的中日经贸合作的新篇章。在《中日两国关于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 文件强调了正视历史、面向未

来的基本精神。国外的一些媒体说中国政府不再提历史了, 这是一种片面的误解。因为, 在新的政治文件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 发展中日关系就要“恪守前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原则”, 既然前三个政治文件已经把历史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在 21 世纪签署的面向未来的政治文件里就不需要逐字逐句地重复前三个文件关于历史问题的描述。原则上是恪守、继承前三个文件, 也自然包含了“正视历史”和“面向未来”的双重内容。因为, 历史问题必须正视, 过去不幸的历史我们没有能力再改变它, 已经发生了, 但是一定要防止不幸的历史重演, 防止再发生, 所以“正视历史”只有四个字, 但是历史问题并没有丢弃不管, 而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 我们希望日方公众能够理解中国人重视历史主要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主要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段两国在 21 世纪初期开展友好、合作的可圈可点的历史。

(四) 改善民间关系拓展战略互惠空间未有穷期

伴随中日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 两国共同发表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里, 关于今后交流合作项目、计划、领域已经多达 70 个。中日高层经济对话更促进了两国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那么, 中日之间的互惠合作是否已经“饱和”? 答案显然是否定。胡锦涛主席曾强调指出: “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 中日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性意义。中日双方要共同努力, 不失时机地将中日关系推进到更高发展阶段。” 事实上, 中日两国无论在谋求共识的精神层面, 还是在寻求合作的现实层面, 都有继续拓宽发展的空间。按照早稻田大学国际地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迪教授的观察, “尽管在制度上日本政治引进了很多欧美政治的框架, 日本政治的过程仍然存在大量的东亚传统政治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 中国和日本其实都远没有西化”。对于两个大国家、两个大民族之间最终的和解一定需要民众层面上的和解, 中国的外交也是以民为本的, 日本也是一样的, 政治家也离不开老百姓的要求, 如果只有一个轮子, 官的轮子走得很

快，民的轮子走得很慢那就会走偏，所以草根的交流，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两国民众真正能对对方有所宽容，有所理解、有所包容，这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文化交流是今后应该大力加强和推进的一个重要领域。

就现实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而言，随着接触交往的增加，以及形势的发展变化，某些突发事件也会成为交流合作的契机。例如，伴随“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首脑互访，中日在安全防务领域的交流合作正在全面铺开。双方会谈所涉及的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灾难救助领域合作”事宜，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立即由拟议中的计划变为现实的救援行动。日本在灾难发生后及时派遣救援队和医疗救护队赶赴灾区，不仅表现了两国关系改善后“互助互惠”的实际行动，也的确让中国老百姓感受到在和平发展道路下成长起来的今天的日本人的良知和友善。尽管航空自卫队到中国运送救灾物资也受到日本国内和中国部分网民的批评，但只要自卫队参与救援的行动，能够象此前救援队那样用实际行动表现出对中国帮助的真实感情，是可以得到最终理解的。

清朝前期有一个叫魏禧的大文豪写了一本书叫《日录里言》，那里面谈到人和人应该如何处理，其实放大到国家、放大到民族也是差不多的。“夫交友者，识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中日在相互了解中，寻求战略定位的一致性，克服相互猜忌、怀疑的偏见，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真正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记得

亨廷顿曾预言：“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幸福，取决于中国与日本的共生，并找到携手共进的道路。”不管亨氏其他理论如何，作为研究国际战略关系大家，这一论述可谓不无道理。中日两国首脑将通过会谈共同谋划未来两国关系美好前景，而东亚两个巨人的握手将对地区乃至世界产生深沉久远的影响。

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引自 1952 年 4 月 30 日，新华社电传稿。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90 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70 页。

《园田直访谈》，载《周刊文春》1978 年 9 月 21 日号。

三菱综合研究所编：《中国信息手册》，1992 年版，第 270 页。

参见高洪：《略论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载《亚非纵横》2008 年 03 期。

引自五百旗头真 2006 年 10 月，为安倍访华在东京普雷斯中心大厦所作的演讲《新政权下的日本外交》。

引自 2008 年 5 月 4 日，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起程前接受日本驻北京记者联合采访。见新华社电文。

引自《环球时报》，2008 年 4 月 14 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崔新京)